

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情怀

——写在恩师逝世十周年之际

□ 王延中

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但他的精神以及当年对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这些年来的工作与生活。先生的年纪、学识、身份和社会地位超出我们这些学生很远,我们要完全了解他和理解他是不容易的。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与在社会学领域的感受相比,感觉对先生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不论读书期间还是工作之后,费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深远的。我和先生的直接交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读书时期,一是从北大毕业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工作时期。这两个时期,和费先生的交往各有千秋。读书时期和毕业之后,我们都写过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里能够看到当时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写文章时也是有情境的,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写进去的,但是接触过程中一些主要的事情都写进去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研究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演变,研究他在培养人才、培养学科传承人等方面贡献,这些可能是一个线索。

从1988年我跟随先生读博士开始到2005年近20年时间,我和先生每年都有直接的交往。这种交往使我对先生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先生培养人才不拘一格,一是先生的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我看来,先生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社会中的人,而不是后来被人神化了那样。他是一位特别有人情味的老人,一位非常善良、睿智、善解人意、善于沟通的人。他比我年长50多岁,一位与我相差两代人的老者,我们很难与他直接进行学术思想上的平等对

话,但事后回想起交流的场景,重温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学术思想,就从心底里感到他像一个灯塔,引导我前行。当时可能体会不到,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他的所言所想,无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世纪老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

一、培养人才不拘一格

费先生非常重视师承关系。他曾经对吴文藻老师有过“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度评价。由于不同的人生际遇,费先生的道德文章得到了很多后学晚辈的高度认可。从我们跟他晚年学习的情况看,他不仅自己在学术上孜孜以求,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很花心思,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从20世纪80年代招收社会学博士到2005年去世,这20多年时间,从他手上拿到学位的学生是屈指可数的,但是他的学生可以说是遍天下的。国内学生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正式的拜师读博士,现代的教育制度是通过这个来完成的;另外的一批学生就是认同他的学术思想、理论,被他的学说和理论所影响,从他那里得到教育的那些人,他们自认是费先生的学生。这一部分学生数量很多,而且是跨年代的,可以从西南联大算起。在社会学所工作的人很多是他那时候的学生,有的是费先生直接教过课的,有些就是听过费先生的讲座或者看过费先生的书。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1957年前后,他也有一批学生,一批研究助手。还有一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在研究活动中带起来的科研助手,包括李友梅等人。这些人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陈学金同志的采访资料,主要谈跟随费孝通先生学习的一些感受,时间已久,难免存在记忆差错或认识偏差,恳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感谢陈学金同志的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王延中(1963—),男,山东东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和劳动社会保障研究。

都在他手下受益良多。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是费先生教书育人的一个特色。当时,费先生带我们的时候,学生还不多。他利用开会、论文开题答辩或学术讲座的机会,与我们好几届的学生在一起举行“习明纳”。他说,我也不给你们讲课,你们来看我的时候,或者开个会的时候,或者你们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就讲讲我的看法,你们就当学习了。就这样,当有博士论文答辩,研讨会他发言的时候,我们都去听。不分年级、年龄、性别,不分博士硕士。他知道我们的底子薄,需要学习弥补的知识很多,更多地采用鼓励和引导的方式表达他的评价和看法。他从不不会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批评你,往往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讲他的意见。比如他说,“我姓费,我说的话,你们也不一定觉得有价值,你们就当我说的是‘费话’好了。”然后,就对我们这些学生近期学习研究情况进行指导和评价。对周拥平、李慷、徐平等师兄的论文都做了认真的点评。他对学生非常有真情,有什么需要甚至其他方面的困难,他都帮你出主意,想解决办法。在学习方面,他不强迫大家按照他的观点去做研究,但是他在很多地方的调研及“行行重行行”之后写出的文章,成为我们很多同学博士论文选题的开题指导。针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他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带领我们学习,让我们深入到社会实践一线去调查、做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他不是教你他做了什么,而是教你一种思考的方式,和一种方法。这点,他受美国的老师派克的影响非常大。派克曾对他们讲,“我不是来教你们读书的,我是来教你们如何写书的”。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他从不干预。对于追随他做学术研究,他不仅仅是鼓励引导,更是开山辟路,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来。

费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国际上也有很多后辈学人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指导。他在各种情况下力图完成好这个任务。但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做到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国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通过他的著作来认识中国,对他也非常认可。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正是格迪斯的请求使费先生重访江村。在重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重访江村》,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难得的一次田野调查成果,但也因为多种原因,这篇成果也成为他遭遇的人生挫折的证据。

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费先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情怀的社会学家、人

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同时,他是一个理性的学者,在探讨问题时都是理性的。但他心里和文字背后都充满了对中国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深深的同情和人文关怀。从哪些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改变穷困、落后的面貌和命运,希望他们走上现代化之路,他总是怀有这样的一种目的和期许。

他表达感情很真挚、非常动人。不管是家乡的人们,还是少数民族的同胞,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帮助他们,希望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以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在他那里,没有大汉族主义。这和很多学者是不一样的。我到民族学所工作之后,对这点体会特别深。

费先生是在沿海地区长大的,肯定受到国家主义、国家认同、现代国家构建等思想的影响,在《乡土重建》里面,他并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或逻辑推理来改造农民、改造民族地区,改造少数民族文化,它不靠强制的、外在的力量,而是更多地给他们希望,给他们方向,给他们引导,给他们支持,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文关怀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深层理念和情怀。这种理念和情怀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现在,现代化进程非常快,有很多的问题或弊端,不能听之任之。费先生当时其实看得很远,这种思想和意识源于他早期对机器工业革命的问题的学习和理解。费先生曾翻译过《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那时他就对于理性化、科学化是很警惕的。当然,后来费先生思想转向了,他还是希望广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要现代化。他在想如何使这个过程不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而是发自内心愿意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而不是党和地方政府的视角,他很重视方式、方法如何让老百姓乐于接受。

三、天下观念和全球视野

先生在很多方面是以天下为家的,他是有胸怀天下的整体世界观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么重。据我对其家庭成员的了解,他对子女及其后代十分关爱,但是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取什么便利。可他也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他如何处理他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先生是以社会为重、以天下为己任的,而不是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么重。这对我们这些学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学者到了比较高的境界,他应该越能超越“小我”,进入“大我”。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能超越于小环境——他

的家乡人民、调查对象,他考虑的问题是具有规律性和全局性的一些大问题。比如说,他指出用市场经济价格机制来促进农民进入市场,促进沿海地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他在京九线“串糖葫芦”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京九线一面连着浙东地区,一面连着市场经济,它往哪方面走要看它怎么选择。其实,可以看出来他的取向。他到了民族地区,总结出了很多方案模式,其实,他更多的看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力量,但这种自我发展力量需要外力,他将这种外力视为当地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替代品。他有全局观和整体观,能够超越“小我”。他的思想深处,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其身上的延续,他有很好的家训。

他是中国20世纪初期就出国留学的学者,进入了当时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国学习。学贯中西,使他拥有全球视野和世界一家的境界。在出国留学之前,他在教会大学受到过传教士的熏陶。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受到他的几个国外老师的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自己的老师,国外的老师写了三位,一个是在燕京大学讲过课的派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史禄国教授,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他对史禄国的学术是非常敬仰的,但对其不能报国这一点,其实很惋惜,他是一个流落在国外的不能炫耀于世的著名学者,心怀祖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他很敬仰马林诺夫斯基的地位,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的祖国波兰没有贡献什么,是一个客死异乡,誉满全球,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知识分子。费先生景仰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认为自己没有达到他的位育论那样的高度。吴文藻是费孝通的老师,若从学术造诣来说,或许费先生远远超过了吴先生,但是吴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是很有眼光的。吴先生是牺牲自己培养人才,费先生对此也是非常感激。还有一个老师——郑辟疆,郑辟疆爱慕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当郑先生去世后,费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费先生和郑是同代人,郑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是个没有什么大的学术贡献的学者,但他对费孝通影响也很大。像郑辟疆一样,费先生希望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于自己取自社会的收益,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境界的一种体现。费先生有很多文章富于感情色彩,这是感情色彩比较浓的一篇。

费先生能够超越“小我”进入“大我”,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有关。传统文化中有对知识分子的熏陶和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科学思维使其变成现实。他走一路,写一路,行

行复行行,全部站在全局的角度,这些对于后人真的理解他的思想留下了重要的线索。

四、文化研究的三重境界

1998年,先生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后,就是“无官一身轻”了。虽然政治待遇还有,但是实际上他考虑的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事情,而是全球命运、文化共荣的问题。所以,我印象第二深刻的就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这是学人类学、民族学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话题,是先生学术追求的一条主线。他的学术,除了“志在富民”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之外,我觉得在其思想深处,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支撑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里面一个不灭的、或者称为没有扭曲的方向,就是文化研究。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与他个人的际遇有关系,还与他的天下观、人文情怀、作为一个知者有关。对于他对文化的持续关注、对文化的深刻见解,我想主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文化自觉理论。这是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留什么,扬弃什么,目标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创新的思考。对于这个问题,我和他有一次对话。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做一个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国际合作课题,叫亚洲价值观与社会治理。我负责中国价值观演变子项目。我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人主流价值观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其中的几次重大转折。但无论如何发展变化,我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强调群体价值,个人价值来源于集体,要从属和服务于群体(集体、社会或者“家、国”)。这和西方自由、民主、博爱里强调个人本位、个人自由不太一致。中国的文化如何实现转变,是否需要向西方那样转为个人价值超越集体价值才算是现代化。我一直比较困惑。当时费先生写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现代化的很多文章。我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希望得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给了我一些他的文章,但没有给我直接的答复。其实,直到今天,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开。

中国社会是走向个人本位的西式的路,还是继续保留我们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大局的集体主义的整体的社会观,我觉得这是西方道路和东方道路的矛盾。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上层的一些法学家、政治家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选择的是集体大于个人,而西方选择的是集体要为个人服务,要为个人主义让路。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到,他的

文化反思里面强调文化的现代化,而这个核心命题怎样去把握,他没有给我回答。也许费先生的做法是非常聪明的,对这个问题不用做出一个是与非的明确的判断。也可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你不能说中国只能选西方的路,或者保留自己的传统。关键是如何在文化更新之中实现适应时代要求,作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个人本位、集体本位,也许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群体、个人、国家、社会的关系研究上,费先生有很多贡献。也就是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已经规定了个人要服从于整体。我们集体主义观念也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和国家是什么关系呢?最典型的群体是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而且具备仅次于国家的一种群体的共同体性质。他研究过很多群体,比如说家庭、村落、集镇。家庭以血缘为联系纽带,虽然组织细胞最完善,但毕竟只是一个小群体。最大的群体当属于全球人类社会,但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和国家无疑是两个最值得研究的群体现象。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无法说明中国从历史上看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他从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开始,一直希望解开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这个难题。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面,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如何建构,各民族成员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十分重要,迫切需要理论界的科学解释而不是武断的意见。经过50年的思考,他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从这篇文章中,他终于想明白、想通了这个事情。中国50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层,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下还有50多个民族,甚至可以进行更多地分层。这是他搞民族学研究、调查、民族识别工作,以及他对民族理论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很成功的,并被中国共产党接受,成为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将来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地探讨。这一块内容,我很认同,但是他是用历史来论证,他不是用逻辑和学理来论证,我们民族学和人类学如何从学术的角度在理论上加以阐释,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在向这方面努力。因为这个理论和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也就是一族一国理论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超越。

第三个就是他的天下大同的思想——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际上,他是想超越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想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人类社会的一个终极目标。1988年,他给我们讲文化冲突,就讲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讲巴勒斯坦的小孩用石头打以色列的坦克。他的发言针对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再到2014年刚刚发生过的克里米亚问题、苏格兰公投等很多所谓“民族自决”的实践,可以发现,不同群体、不同民族拥有各自的文化,文化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的。但是,存在差异性的不同的文化之间如何相处,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费先生提出的理念首先是“各美其美”,自己当然认为自己的文化好,但是“美人之美”就不一定能做得到了。你欣赏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欣赏别人的文化,就可能发生紧张和冲突。文化在接触之中还有涵化,你接收某种文化之后,就会成为其一部分,你不可能理智地对待异文化。怎么样做到美人之美,这是需要智慧的。你只有超越了各美其美这个阶段,才能进入“美美与共”的阶段,各种不同文化才能并存、并荣。高层次的异文化认同应该是不矛盾的,从双层的结构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并列的结构怎样来看呢?特别是有了政治实体国家之后,国家有国家的利益,群体有群体的利益。在国家内部,可以通过政府来调节;在国际上,国际法并不是国内法律,没有办法调解不同国家的利益之争。所以,要实现文化的大同,美美与共是一个愿望,是得到人们认可的天下大同思想的当代版和现代版。我觉得这也是费先生的一个终极理想。但是,这条路注定是非常漫长的。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费先生的文化论》,但是那时我写得浅。我现在认为,先生文化研究的三个方面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也是世界面临的挑战。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只有一种主导的文化和价值观就可以一统天下了呢?还是要美美与共,互相欣赏呢?我当时的问题在这里。我说有没有一种天下统一的文化体系,他没有回答。在与他的交往中,我知道他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对待这个问题,不轻易表态。他看准了,就用优美的文字,将深邃的思想浅显易懂地、深入浅出地展现给世人。我觉得费先生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楷模,也是我们这些后辈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102)

(责任编辑:孙菲)